

光辉历程

在民族危亡关头凝心聚力

——我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大地烽烟四起。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并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屡战屡败,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淞沪会战爆发。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当年夏秋之交,八路军三大主力东渡黄河,经“山西王”阎锡山的许可,在侯马乘坐火车,经太原依次抵达山西抗日前线。

八路军115师日夜兼程挺进山西后,于9月25日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120师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129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等一系列辉煌战果,适时地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些辉煌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云龙介绍,从红军自身发展、山西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当时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考虑,红军东征后,毛泽东不断致信阎锡山及其部下,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

“随着日军染指绥远,步步紧逼山西,阎锡山召开会议征求意见,结果31票对7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杨云龙说,根据阎锡山的转变,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驻太原,同阎锡山进行直接、经常的联系。

1936年11月12日,彭雪枫被派到太原,向阎锡山表达了红军愿与晋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并在首义门“基督教青年会”六号院,建立了秘密联络站;1937年3

月,为方便使用电台,彭雪枫用化名和假身份在太原新满城街租了一套四合院,对外称“彭公馆”;随着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满足人员增加后的办公住宿需要,八路军办事处迁址到坝陵南街成成中学原址,8月30日挂牌办公。

彭雪枫等人在太原作报告、搞演讲,大力宣传抗日游击战争思想,还接待了来到办事处的各界慰问团及《大公报》《战时画报》等中外记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太原的热血青年经他和办事处的介绍走上了抗日前线。

1937年的太原,成为华北抗战基础最好的地区,成为华北救亡运动的中心。

杨云龙说,七七事变后,我党多次指派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商谈红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协同作战问题。同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太原。在彭雪枫陪同下,周恩来等人与阎锡山交

涉谈判,在八路军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关系等问题上达成广泛的一致。

“当时蒋介石让八路军到河北去,但毛主席坚持到山西,阎锡山不仅同意了,还让八路军坐火车、给八路军配枪。”杨云龙说,山西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是党领导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如果没有统战工作,八路军开赴山西不会如此顺利。

如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旧址只剩下三间由太原市政府挂牌保护的历史民居。

山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较早实践的地方。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1937年9月,广泛团结全国爱国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文/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新华社电)

丧胆的战法: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

1945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军发起大规模夏季攻势,先后发动察南战役、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

同年8月,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等城,一部进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等,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攻占城市70余座,解放了西迄同蒲铁路,东到渤海、锦州,南临正太路、石德路,北至多伦、赤峰的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力不集中……”从晋察冀根据地开始,敌后根据地如同四散的火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新华社记者 王菲菲
(新华社电)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记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佛教圣地五台山,五峰耸立、千峰环绕。抗日战争时期,以阜平、五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个“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如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的心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在取得抗战开始后的首个胜利之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晋西南,而由政委聂荣臻率领的第一一五师一部及军政干部共3000余人则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次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共

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寺庙的和尚、喇嘛等140余人,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颁布实施的各项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根本改变了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政权垮台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使敌后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成立,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全面领导边区的党、政、军和群众工作。这年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辖70余县,拥有居民1200万,武装力量约10万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引起了日军极大的恐慌。他们在华北采用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蚕食”。日军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根据地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

面对这样的局面,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时,抗日根据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方法,采取“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

在高山的山冈上,在密密的丛林中,在遍地的青纱帐、芦苇荡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锤炼出了一整套令日寇闻风

民族脊梁

焦裕禄：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时至今日,年过古稀的护林员张二宝依然清晰地记得焦裕禄下葬的那个上午: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们,黑压压聚在兰考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在寒风中久久站立……

兰考人心目中的“老焦”——这位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县委书记,如同一面旗帜,穿越时空,一直屹立在中国大地上。

50多年过去,兰考变化翻天覆地。但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焦裕禄书记留在那里的身影,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辛酸镜头:1962年冬,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困扰的兰考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外出逃荒的灾民……

“有位省领导来视察,看到兰考灾情严重,提出不如一分为四,把兰考划给周边四个县。焦书记当时就说,情愿累脱三层皮,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兄弟县。”提起焦书记立“军令状”的往事,时任县政府办公

室主任的樊哲民仍唏嘘不已。

1963年种麦时节,当时28岁的葡萄架村会计孙世忠陪焦裕禄视察灾情。在他们村,焦裕禄一住就是3个月。他给村里调来10辆架子车搞运输,鼓励村民栽桐树防风治沙,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盐碱地,还联系医院掏腰包,救了刚满周岁的病危孩童张徐州一命……

“焦书记喜欢到基层,喜欢和群众在一起,村里栽树他陪着一起劳动,饲养员喂牲口他忙着掂草……”经常陪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干事刘俊生回忆。

1963年冬,焦裕禄冒着严寒叩开许楼村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握住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的手,焦裕禄问寒问饥。一旁的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老人不停地抚摸着焦书记,热泪纵横。

人们的记忆中,在兰考期间,焦裕禄除了开会,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焦裕禄纪念馆,存放着他50多年前骑过的破自行

车,还有他穿过的胶鞋,靠着这车和鞋,焦裕禄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回忆,焦裕禄平时要求家人不搞特殊化。“我有一次到县委提了壶开水,父亲知道后批评我说,水是烧给县委上班同志喝的,我们不能喝。”焦守凤中学毕业后,按当时的条件,本可以找个像样点儿的工作,但在焦裕禄的坚持下,最后她到县食品加工厂的酱菜组“接受锻炼”。

长期的劳累和一再拖延,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一次,孙世忠眼见焦裕禄用个茶缸子顶着腰,问是咋回事,焦裕禄强忍痛苦摆摆手;1964年春,治河施工时,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焦裕禄,仍带着县里干部参加劳动,在工地背光机时几次摔倒。

1964年3月底,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院,一个多月后病逝,年仅42岁。“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遵照焦裕禄遗愿,人们将

他安葬于兰考。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不长,仅仅475天,但兰考人民记住了他一辈子、几代人!记者近日来到兰考再度寻访焦书记的足迹,当地干部表示,半个世纪过去,焦裕禄的事迹和精神仍能引起全社会强烈共鸣,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的热切期待和强烈呼唤。

“50年了,老书记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还在我们身上吗?”2014年春,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如是发问。那年起,县委、县政府向兰考人民庄严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百姓谁不爱高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焦裕禄,用赤诚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教育着共产党人。

文/新华社记者 张兴军 冯大鹏
(据新华社电)

长春市的“80后”,几乎没有人不熟悉蒋筑英的事迹。“我就是小学看了好几遍他的电影之后,才下决心在大学报考光学专业的。”韩冰说:“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伴随电子学技术和新材料的不断发展,光学及光电成像设备也在飞速发展。蒋筑英生前所在的机构大部分职能现已并入韩冰所在的质检中心,他的光学传递函数数学成果已经广泛运用在航空航天、地面测控等各类光电成像设备的评价中:从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天宫一号、吉林一号到即将发射的碳卫星,每个光机所研制的航天光电成像设备都经过了严格测试。

贴近生产、服务民生,在风风火火的科研事业中,韩冰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今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蒋筑英的执着和幸福。随着不久前“科技三会”顺利召开,他们认为科技界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新时代的“蒋筑英们”将沿着前辈的足迹再出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

文/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孟含琪
(据新华社电)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

作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原研究室代理主任,蒋筑英曾为新中国填补了光学设计评价领域的科学实践空白。今天,新时代的“蒋筑英们”拓展其研究成果给航天器“擦亮眼”,继承他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的精神品格,为祖国的科研事业默默奉献着。

蒋筑英1962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后考取了我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的研究生。1965年,27岁的蒋筑英毕业后在长春光机所致力于光学研究工作。当时,我国光学镜头的像质评价领域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评价镜头质量只能通过观察成像质量等主观方法,拍摄角度或景物都可能影响成像,这种方法很不客观”。长春光机所国家光学机械监督检查中心副主任韩冰说。

1965年,蒋筑英带领研究小组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75年,我国进口了一批玛米亚相机和大型轮廓投影仪镜头,蒋筑英团队通过测量装置找到洋货镜头质量上的严重问题——像散、中心彗差、雾状霉点等,并一一拍成照片,交给商检局去交涉。外商在看到详细的检查报告后,连称“中国人有内行”。蒋筑英不仅为国家避免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且还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对待工作是严谨的内行,对待同事如“春天般的温暖”。原长春光机所四室高级工程师冯秀恒回忆说,蒋筑英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译好誊写清楚后送给相关课题的同志;他曾帮助同事一遍一遍修改论文,可发表时却不

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报告时,他让与他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

1982年6月12日,蒋筑英赴成都验收X射线天文望远镜空间模拟装置时,由于工作劳累,致使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6月15日在成都逝世,终年43岁。聂荣臻元帅为其题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当噩耗传至长春光机所时,大家都感到震惊和悲痛。“即使是他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还装好了实验室窗帘的挂钩,抹好了办公室门前破损的路面,帮助同事家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痛代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冯秀恒说,蒋筑英去世十年后,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影响了更多人。

生于1981年的韩冰说,凡是出生在



在泉城济南,有一个享誉全国的家政服务品牌——“阳光大姐”。十几年来,“阳光大姐”累计培训家政服务人员24.3万人,安置就业158万人次,服务146万个家庭,为服务妇女、服务家庭、服务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卓长立是“阳光大姐”董事长、总经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以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领“阳光大姐”一路前行,把温暖送进千家万户。她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

无怨无悔的选择

2004年的一天,刘桂香在“阳光大姐”公司门前徘徊。47岁的她下岗已3年,找工作四处碰壁。“到这里,人家能给我阳光吗?”她怯怯地想着,对前程一片茫然。

正在踌躇中,一双温暖的手拉着刘桂香走进楼内。来者便是卓长立,她动情地对刘桂香说:“我曾经也是一名下岗女工,这里就是你的家。”刘桂香仿佛像一个多年漂泊在外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禁不住流下热泪。

2003年,不惑之年的卓长立放弃收入丰厚的工作,接手刚刚起步的“阳光大姐”。回想当年,卓长立说:“接手阳光大姐,我有顾虑,有压力。刚刚起步的家政是微利行业,想发展壮大十分困难。但是,想到姐妹们的期待和信任,我就感到了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005年,新农村建设工作步伐加快,济南市周边产生了大批待就业农民,她们文化水平不高、年龄不小,就业成了难题。卓长立抓住机会,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家政培训,实现就业。看到学员们交通不便,卓长立就每天开车接送,刮风下雨从未间断。四五十里的路上,卓长立与农村姐妹聊家常、讲理念,一路上欢声笑语。卓长立的真情与付出感动了大家,从事家政的人员从起初的几个人、几十个人,到后来的几百人、几千人,涓涓小溪汇成大河,仅济南的十六里河镇就走出7000多名家政服务员。村里的富余劳动力找到工作,收入增加了,邻里和睦了,妇女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看到一个个下岗女工从初到“阳光大姐”时的彷徨无助到成为金牌月嫂、首席技师的自信与自豪;看到一名名女大学生从找不到可心工作的苦闷与失落,到爱上家政服务这份事业时的坚定与执着,卓长立心中就有个响亮的声音:我来“阳光大姐”,值!

现在,刘桂香已成为首席金牌月嫂,收入增加近10倍,还被评为全国家庭服务业优秀服务员。刘桂香自信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家政也能当状元!”

让标准成为习惯

干家政还有标准?听起来有点夸张,家政服务员们纷纷摇头;初出茅庐的家政企业能做标准?听起来不太可信,有关部门投来质疑的目光。然而,卓长立始终不放弃,顶着质疑和压力坚持做标准。

卓长立全身心投入。她在全国率先引入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起以服务质量、服务管理、工作标准为支撑的标准化管理体系。这些标准不仅成为家政服务员上岗前的培训书、服务过程中的操作指南,也成为消费纠纷发生后的评判书。有了标准的支撑,家政服务不再是简单的“做饭、打扫卫生、看孩子”,而是形成了以标准为主体的系列家政服务产品。通过制定标准、标准培训和标准实施,“阳光大姐”的管理水平显著提升,用户满意率由最初的70%,上升到98%以上。

在卓长立的不懈坚持下,“阳光大姐”的标准越做越多、越专业,甚至连土豆丝切多长、多宽都有了标准。

目前,卓长立带领“阳光大姐”制定了9项山东省地方标准,5项国家标准。2015年,由卓长立牵头起草制定的《家政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正式实施。

去年,“阳光大姐”举办了全国家政经理人标准化培训班,全国各地200多位同行前来学习。“阳光大姐”发展模式在全国推广,行业引领作用凸显。

为更好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促进家政行业转型升级,卓长立不断创新。她规划建设家政服务集聚示范区,发挥教育培训、创新研究、信息化、产业示范与推广集聚的作用,打造服务家政企业的大平台。

卓长立就这样一直忙着,把阳光带给行业,把阳光带给企业,把阳光带给员工,这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阳光。现在的“阳光大姐”,已有6000多人具备高级职业资格,300多人成长为专业导师,30多人被评为首席技师、突出贡献技师。



卓长立(前排右二)与家政服务员们交流。(资料图片)